

什么是大学?

一所大学,即使是一所研究型大学,其使命主要是为了教育学生还是为了创造知识?事实上,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名牌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它们的声誉主要源自它们从事的学术研究。近十年来这种效应增强了,是因为依据定量方法进行世界大学排名,以及以此为标准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在积极推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发挥了显著作用。1998年,中国提出了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随之而来的是如何来衡量的问题。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启动了世界大学排名研究,它是依据对学术刊物以及诸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等被显著认可的客观指标进行定量测算。它的排名以客观的定量指标为依据,使用的所有相关学术论文都已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涉及几乎所有的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领域,但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则很少。

这个排名在欧洲有很大的影响。它令人信服地表明美国高等教育何以在世界上占有主导地位。在2003年的首次排名中,在前20所大学中,美国占15所,英国4所,亚洲1所,欧洲大陆1所都没有。在排名前50所大学中,美国有35所,占70%,欧洲有10所,其中欧洲大陆仅5所。这引起了欧洲人特别是大陆欧洲人的震惊。欧洲是现代大学(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以及现代研究型大学(德国的洪堡大学)的发祥地。欧洲人强烈感到他们的大学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大学,特别是在研究方面。

上海交大排名在发展中国家中影响也不小。排名前两名的中国大学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排在200—300名之间,这清楚地表明它们还远达不到“世界一流”水平。从中国到印度,从新加坡到海湾国家,世界上许多政

我家对面,店铺紧挨店铺,毫无空隙。我家刚搬过去时,对面是一栋五六层高的板楼,楼前是一米多高的铁栅栏。那时,路边没有人行道,除了出租车临时停靠,绝无私家车占道久停。当年,小街两旁有许多老树,很安静,买东西却不方便。

大约在我家搬去三四年后——街口一处居民小区开盘了,房价涨到了每平方米一万多元。小街住户翻了数倍,人口变得相当稠密。街对面板楼有几段铁栅栏也拆了,几户人家将房子租给了外地人开店铺。

仅一年后,所有一层人家的房子都成了店铺。附近三处高楼社区很快就住满了人,车位也不够用了。不论在小区内,还是街上,人们常为车位争吵,甚至大打出手。

2005年前后,这条在三环与四环之间的小街,成了北京市最“脏乱差”的街道之一。早晚车辆堵得水泄不通。天气热时,街上时有臭味;下雨天,雨水是黑的,漂着油。

近几年,小街面貌有所改善。一些老旧楼房刷新了,加了保温层。路面也重铺过两次,老树虽然很少了,新树却在一年年地长高。

【阅案所得】

大学使命的三个根本问题

府都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投入大量资源,以提高它们在排名中的位置。具体做法是增加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论文发表数量。

但这个排名也导致了偏差。当政府制定政策以提高大学排名时,他们只专注于研究,而且大多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方面的研究。他们从教学,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面转移了注意力,而这些领域比其他领域对教育人更有关联。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提高排名位次的过程中,出现了系统性的偏差。

那么大学的使命到底是什么?难道只与研究相关,而与教育无关?是否它只与《科学》、《自然》上发表论文有关,只与诺贝尔奖得主有关?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说过一句话:“一所大学如果没有论文发表,它当然算不上是一所一流大学;但是如果在教学上失败,它甚至都不配称作大学。”

2010年年初,清华大学原副校长、时任天津大学校长龚克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学生与教师,学生与研究,学生

与学术,哪个才是大学更基本的?他的看法是学生教育应该优先于教授研究。

说比做容易,因为排名带来了声誉、公众认可以及资源。研究容易度量,而教学和教育却不容易度量。

什么是教育?

这个问题需要处理如下关系,即传授有用的知识,还是培养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有两个原因使得社会压力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显然,市场力量是倾向前者的,它要求毕业生能对企业有用。此外,政府也要求毕业生对国家有用。市场和政府都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学习那些对你的就业和国家立即有用的东西吧。这通常意味着技术技能,而非人文素养;这也意味着要服从、听话,而非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

但是,大学不是培训学校、职业学校或训练营。大学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教育青年成为“有教养的文明人”,不只是“有用的机器”。爱因斯坦在美国高等教育三百周年纪念会上(1936年10月15日)谈到教育时这样说:它应该发展青年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个性应当被消灭,而个人只变成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仅仅是社会的一种工具。

另外,我也要反对认为学校必须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观点。生活所要求的东西太多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取这样的专门训练。除了这一点,我还认为应该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不幸的是,爱因斯坦的教育理念遇到了想让学生成为有用之才并立即就能服务市场、报效国家的强大阻力。这是一种“短期功利主义”的

教育观。这在穷国比在富国更加严重,因为在前者,如何在经济上能够生存是学生们更为优先考虑的问题。

在中国,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因为中国大学历来就承担政府和企业的的项目,它们往往在实用性很强的后期开发中成为企业的替代者。世界上其他大学也从事这类研究,但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一批清华大学的工科教授于2010年4月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工学院访问,伯克利工学院副院长谈到他们成立了一家新的电子工程领域的研究中心,中心是由几家全球领先的公司共同资助的。对于这种情况,清华大学的教授很难理解。“你们的研究中心怎么能由相互竞争的公司联合资助呢?”答案是:我们只从事早期阶段的研究,商业应用至少要等五年以后。所以,在这个阶段这些公司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显然,清华大学的情况不同:研究中心多为公司从事后期开发研究,如果由不同公司赞助,相互之间就会存在竞争。这个故事说明了中国顶尖大学做研究的性质。尽管中国大学的研究经费激增,但大多数资金用到了后期开发项目的研究上。

尽管中国的大学有着强烈动机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但是承担政府和企业的项目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更强的激励。这类研究在短期内对国家和企业是有用的,但是如果它们不能提供对未来有意义的知识,那就算不上长远地服务于国家和企业,而且也不会改进我们对世界的根本认识。

我在这里提出了有关大学使命的三个根本问题:什么是大学,什么是教育,什么是研究,如此之简单,却又如此之基本。但是,在当今中国,在这些涉及每一所大学的最简单而又最基本的问题上,我们还没有一致的认识。

(摘自《大学的改革》第一卷,钱颖一著)



不出受到多少房租涨价的负面影响。理发铺也不受此影响。男人半月、一个月才理一次发,女人一年做两次头发,都对理发铺涨价充分理解。但这种理解不一样给予开洗衣店的人——如果洗一件毛料衣服从20元涨到30元、35元,许多人就宁可家用家里的洗衣机了。

故小街上“吃”的经济一直方兴未艾,充分体现了“民以食为天”。

吃喝、旅游、下一代的抚养成本、自身的健康成本(包括医药费)——拉动内需,基本靠国人此四方面的消费。

对于到境外旅游的中国人往往会成为“暴购”团,爱国人士每每大发惊诧议论,责备有钱为什么不花在国内——其实,中国人在国外的“舍得”消费,除了外国商品质量确优,也还有“玩”得尽兴与否的心理左右。在外国特“舍得”地消费几次,能更大程度地满足自己“到此一游”、游得潇洒的良好感觉。

当然,仅靠以上“四项基本内容”为拉动国家的内需做贡献,给力的程度是太不够了。还能靠什么呢?我也想不出来。

(摘自《中国青年报》)

【史海钩沉】

3天打造沿海无人区

康熙曾搞“暴力拆迁”

1661年3月,郑成功经澎湖顺利登陆台湾,一路所向披靡。清政府急了眼,立刻变本加厉,颁布更为彻底也更为残暴的“迁界令”。朝廷先是派人察看东南沿海地势,画出迁界图纸,随即吩咐两位满清王爺监督地方官府按图作业。头一次“迁界”,从山东至广东,所有沿海各处居民一律内迁50里,所有沿海船只悉数烧毁,片板不许留存。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布置兵丁“时刻瞭望,违者死无赦”。

1662年,郑成功全面收复台湾,“聚岛欢庆”。消息传来,清廷气急败坏,再次颁布“迁界令”,勒逼从广东饶平、澄海、揭阳、潮阳、惠来至廉江、合浦、钦州24州县居民再内迁50里,除澳门外的附近海岛洲港,皆封港毁船,禁止居住。圣旨还谕令将界外地区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种,渔民不准出海捕鱼,出界者立斩不赦。紧接着又下令东起饶平大城千户所上里尾,西迄钦州防城沿边筑墩台、树桩栅,派重兵防守。而迁界时限仅有3天,必须“尽夷其地,空其人”,不愿迁走的居民无分男女老幼一律砍掉脑袋。南粤大地顷刻亡者载道,哀鸿遍野,一片凄风苦雨。据粗略估算,仅粤东八郡死亡人数便达数十万。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沉痛地写道:“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就这么着,康熙还嫌“迁”得不彻底。1664年5月,朝廷又称“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下令再次内迁30里。原本不在迁界之内的广东顺德、番禺、南海及海阳居民,又上演了一轮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拆迁悲剧。那时也搞暴力拆迁,大小官员手持“迁界令”,先定下“迁界”的两端,用绳索拉直,作为铁定的界线。一些居民的房屋不幸建在界线上,划界从中间穿过,便被强行拆掉在界内的一半房屋,剩下半壁能住否人,官家一概不管。有的还在界线上掘一深沟,以分内外,稍有跨越深沟,“走出界外者”,便是死罪。清廷派来的巡海使者到新会勘界,更以潮水涌至的河面定为划界的标准,竟然“逼城为界”,使得靠近城郭的肥沃田土全部抛荒。今日繁荣兴旺的广东新会环城、礼乐、江门郊区,那时也列入迁徙范围,一派“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状。

福建直接与台湾隔海对峙,执行“迁界”令自然首当其冲。福建官府起初以插旗为界,随即建立木栅、篱笆为界,后来划界的标准越来越高,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或是挖掘深沟堑壕,或是用泥土高筑隔离墙,再后来索性征发民夫大兴土木,将泥土筑成的隔离墙改筑为具有法律效力应的界墙。同时,沿着界墙按一定距离设寨和墩,五里一墩,十里一寨,建一寨需3000多两银子,建墩的花费约为建寨的一半。这笔银子朝廷不给,逼着当地百姓自掏腰包,“拷掠鞭箠,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

诚然,如一些学者所说,康熙在位期间也曾热衷了解西洋文明,且十分宠信汤若望、南怀仁两位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对他们掌握的西洋历法兴趣尤为浓厚。但毋庸讳言,其认识程度依然停留在前朝万历皇帝的水平,一律以“奇技淫巧”视之,不过满足一下好奇心或充当宫廷生活的点缀而已。西洋文明的核心是什么?乃兴海强国。而出身游牧部落的康熙及其执政团队,与以往用武力征服中原的游牧群体一样,此时最向往和最关注的是尽快融入两千多年来的华夏农耕文明,大江南北的被征服者也热衷于用孔孟之道改造这帮原始落后的狩猎者,用古老文化同化征服者,以平衡原本极不平衡的心态。因此,面对西洋诸国从海路纷至沓来,大洋彼岸的商船、兵船都在猛烈叩击中国的大门,朝野上下皆置若罔闻。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用一纸迁界令摧毁了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海洋资产,人为地将好端端一个海洋国家变成沿海地带渺无人烟的“内陆国”,为日后西方列强大举入侵腾出了广阔空间。

(摘自《最后的海洋与迟到的觉醒:激荡中国海》,王佩云著)

【灯下碎语】

别的生意都不好做 除非和『吃』沾边

□梁晓声

我估计,整治小街的成本远比当年收费和收税的总和高。这如同某些地方“野蛮发展”后,要用更多人力、物力和财力治理。而且稍一放松,又会迅速变回“脏乱差”状态。实际上,如今小街有半段差不多变回了原样。

这里的房价快涨到6万元一平方米了,一套12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标价750万元左右。据说很容易卖出,购房者多是外地人。高楼社区居民有三分之二来自外地,三分

之一是本地人,包括回迁户。

像北京很多小街一样,这条街两侧从早到晚都停满了车。有时一侧还停了两排车。虽然小街成了单行道,但因为没安装监控探头,不守规矩的司机仍会造成拥堵。

2003年时,一处门面房的年租金才1.8万至2万元,租个门面做生意,足以解决全家生计。有的人家靠小本生意在家乡盖了房,或在镇里、县里买了房。租金对房东人家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也不言而喻。偶有城管驱逐占道摆摊的卖菜小贩,居民中的老太太的立场完全站在小贩一边——她们只图方便和便宜,对“脏乱差”的环境最能包容。

如今,门面房租金涨到了每年十万或十一二万元。电费由每度5角涨到了1.54元。不论是那些临街小门面,还是街后超市里的东西,一切都随之涨价了。倘若一户人家的基本收入没增加,从理论上讲,其实际生活水平肯定下降了。

有些门面撑不下去了,如按摩所、洗衣店、杂货铺。但饭店没有倒闭的,菜铺也稳当地存在着。凡是和“吃”字沾边的生意,看